

《古今百物语评判》对儒学典籍的引用：
兼论日本近世“弁惑物”的伦理功用
Ci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Kokon Hyakumonogatari Hyoban*: The Ethical Function of “benwakumono” in Early Modern Japan

任 洁 (Ren Jie)

内容摘要：日本近世“弁惑物”是隶属于“怪谈本”门类下的文学样式，其特色在于不仅收录了志怪故事，还大量引用儒学典籍以解释故事中出现的“怪异”现象。囿于儒学在近世日本被奉为官学的时代背景，弁惑物作家引用儒家典籍并以儒学为思想依据解析“怪异”现象，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弁惑物以消遣为目的的文学特征，同时还大大提升了作品的伦理功用，这体现为：一定程度上廓清了自古以来日本民众对“怪异”现象的蒙昧认知，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通过破除“怪异”之神秘性与超越性以强调儒学的优势地位，有助于幕府推行儒政，具有稳固封建统治的功用；依据“妖不胜德”“妖非德之理”等儒学原理，对人之“德”性提出要求，试图以此协调掌握政治权利的武士阶层与掌握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之间的关系，在推进日本近世伦理建构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古今百物语评判》；弁惑物；儒学；引用；伦理功用

作者简介：任洁，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阶段性成果，并受第6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20M671682】资助。

Title: Ci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Kokon Hyakumonogatari Hyoban*: The Ethical Function of “benwakumono” in Early Modern Japan

Abstract: “Benwakumono” in early modern Japan is a literary form under the category of “kaidanmono”. Its characteristic lies in not only the collection of zhiguai tales, but also many Confucian classics to explain the “strange” phenomenon in stories. Constrained by the era when Confucianism was regarded as an official school in early modern Japan, “benwakumono” writers quoted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nalyzed the “strange” phenomenon based on Confucianism, which not only retained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benwakumono”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d the ethical function of the work. It clarifi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ignorance of the “strange” phenomenon by the Japanese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has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it emphasiz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mystery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strange” in the literary form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likes, which helps the shogunate to promote the politics of Confucianism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stabilizing feudal rule. It is based on Confucian principles such as “妖は徳に勝たざる” and “もとより妖は徳にかたざる道理なれば”. “Virtue” is required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murai class with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eople with economic power, and it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in early modern Japan.

Key words: *Kokon Hyakumonogatari Hyoban*; benwakumono; Confucianism; citation; ethical function

Author: Ren Jie is working towards her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renjie_85@163.com).

《古今百物語評判》（『古今百物語評判』）出版于 1686 年，是由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的文人山冈元邻（Kenrin Yamaoka）与其子山冈元恕（Genjo Yamaoka）共同编写的“弁惑物”¹作品，以在元邻宅邸举办的百物语会上人们的言行为主要内容。从文本内容上看，它与“怪谈本”²有所不同，其中不仅收录了志怪故事，每个故事之后还附有解释故事中超自然现象的说明性文字。在怪谈本十分流行的近世日本，这种具有怪谈本解说书性质的弁惑物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进入“18 世纪中叶以后，它的印刷量已达相当规模”³。但与弁惑物受读者欢迎相不符的是，囿于其附属于怪谈本的劣势地位，与之相关的研究在中日学界均未得到充分展开。虽有学者也关注

1 指试图通过相对客观的解释破除人们对超自然现象或非现实事件产生迷惑的读物。

2 指描写超自然现象或超现实事件的读物。

3 門脇大：「弁惑物と狐憑き・狐持ち：『三才因縁弁疑』と『人狐物語』を中心として」，『国文学研究ノート』46（2010）：13-25。

到弁惑物以“弁”即解析为重心的文体特色¹，但对文体创新之下作品的思想基础和伦理功用等问题的考察尚显不足。就《古今百物语评判》而言，太刀川清（Kiyoshi Tachikawa）指出元邻解析“怪异”基于的是将“怪异”视为“人的精神的产物”或“主观的存在”的佛教思想²；而寺敬子（Keko Sudeji）则考虑到了元邻的医师身份，认为医学知识是他解析“怪异”的主要依据之一³。

然而，作为“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⁴那么，《古今百物语评判》成书时期日本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是否如太刀川清所言，是一个佛教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显然，近世日本已不同于上一时代，儒学逐渐摆脱禅宗与佛教的束缚，发展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以《古今百物语评判》为代表的弁惑物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对于儒学典籍名称及内容的引用。这无疑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弁惑物与儒学的关联。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古今百物语评判》等弁惑物引用儒学典籍的具体范例，结合对当时伦理环境的考察，解析儒学典籍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弁惑物成书及流通过程中所发挥的伦理效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弁惑物之于近世日本的伦理功用。

一、《古今百物语评判》引用儒学典籍范例选析

在《古今百物语评判》中元邻大量引用了儒学典籍的名称及内容，虽其采取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析故事中的“怪异”现象。限于篇幅，本节只列举较具代表性的范例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雷”。在《古今百物语评判》第一卷第八则“神鸣、雷斧雷墨之事”（「神鳴付雷斧雷墨の事」）中，作者元邻对“雷”这一古人认为是“怪异”的自然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阴阳相克则雷生（「もとより陰陽は相剋するなれば、陽はうごいて陰を出さんとす」），雷落坠下之雷斧或雷墨是为陨石（「又雷の槌雷の斧雷の墨などといふ物、其落ちたるあとに、まことある物のよし。其重み長さ色あひ能毒まで書物に待るめれどはかりがたし。猶星おちて石となるたぐひにて、雷ごとにはあるべからず」），而恶人因与雷之气相通故遭雷劈（「悪といかれる気の感ずる所な

1 有关《古今百物语评判》的先行研究可参见：太刀川清：「百物語評判」，『近世怪異小説研究』，東京：笠間書院，1979年；芝憲一：「『百物語評判』の成立」，『仮名草子——混沌の視覚』，東京：和泉書院，1995年；堤邦彦：「弁惑物読本の登場」，『江戸の怪異譚』，東京：ペリカン社，2004年；近藤瑞木：「怪談物読本の展開」，『西鶴と浮世草子研究 Vol.2』，東京：笠間書院，2007年，等。

2 参见 太刀川清：「『百物語評判』の意義」，『紀要=The journal of Nagano-ken Junior College』33（1978）：1-7。

3 寺敬子：「『百物語評判』と医学」，『日本文芸研究』2010（1）：1-22。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りけらし」)。他还列举孔子对雷表示敬意的典故（「此故に孔子も迅雷には必ず形を変じ給へり。是れゆめゆめおそれさせ給ふにあらず。天の怒りをつゝしみ給へるなり」），并在文中点明其对雷的认知来源于儒学典籍《性理大全》（「詳らかに性理大全に宋朝の儒者の論を載せたり」）。而在《性理大全》第二十七卷“雷電”中，确实存在类似的表述：

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

元邻虽未一字不差地引用原文，但所表达的意思与之基本相同。

其次，关于“鬼火”。《古今百物语评判》第四卷第八则“西寺町坟燃烧之事”（「西寺町墓の燃えし事」）讲述的是墓地燃起鬼火的故事。对此，元邻解释到，“怪异”非超越人间世道之物，因较为少见而被称为“怪异”（「其珍しきに付きて、或はばけ物と名付け不思議と云へり」），且世间不存在不可思议之物，其缘由在于世界万物皆不可思议（「世界に不思議なし、世界皆不思議なり」）。在第四卷第九则“舟幽灵丹波的老姬之火、津之国的仁光和尚之事”（「舟幽霊付丹波の姥が火、津の国の仁光坊の事」）中，也有类似表述（「かやうの事つねに十人なみにある事には侍らねども、たまはある道理にして」）。元邻对“鬼火”的解析同样借用了儒学典籍的内容及观点，《朱子语类》第三卷写道：

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

显然，元邻将“鬼火”等“怪异”现象看作是世间万物一部分的表述与程伊川主张“鬼嘯鬼火”属于“造化之迹”的观点，存在一致伦理内涵。除此之外，元邻还引用《北溪字义》卷下以阴阳之气释鬼神的相关表述来解释“怪异”产生的原理：

《古今百物语评判》

凡そいきとし生ける物、何れも陰陽の二気にもるゝ物なし。是れを両儀といふ。その陽の所為を神と云ひ、陰のなす所を鬼といふ。されば物毎のはじまると長ずるは神にて減ずると終るとは鬼なり。

《北溪字义》

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物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

不难看出，元邻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北溪字义》的原文。

再次，关于“幽灵”。《古今百物语评判》第二卷第五则“产女之事与幽灵之事”（「うぶめの事付幽霊の事」）讲述的是幽灵显现的故事。对此，元邻解释到，冤死或被剑戟等刺死的人死后其“气”不散（「うらみ死ににしぬるか、又は剣戟のうへにて死する者は、其氣も形もおとろえざるに俄にしするなれば、（……）其あたゝかなる氣しばしのこるが如し」），而气聚之地常有幽灵出现（「其氣のあつまる所にては鬼魅の精霊あるまじきにあらず」卷三第六「山姥の事付一休物語并狂歌の事」）。此处，元邻将幽灵显现归因为“气不散”，是参考了《朱子语类》第三卷中的相关表述：

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
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诚然，《庄子》有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庄子·知北游》），但《庄子》所强调的是人之生死与“气”的关联，而《古今百物语评判》的考察对象不仅包括人，还包括人之外的世界万象，这无疑与《朱子语类》的伦理定位是一致的。

二、《古今百物语评判》解析“怪异”的思想依据

元邻引用儒学典籍以解析“怪异”现象，其结果就是使得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儒学“鬼神论”特色，“妖由人兴”（「妖は人に由て興る」）¹、“妖不胜德”（「妖は徳に勝たざる」）²等伦理观念成为支撑元邻解析成立的主要依据。除上文中列举的范例之外，诸如此类的还包括《古今百物语评判》第二卷第一则“狐狸传说与百丈禅师之事”（「狐の沙汰付百丈禅師の事」）写道“欺骗乃狐狸之伎俩，不被欺骗源于哲人之德”（「ばくるは狐の術、ばかされぬは哲人の徳なり」）；第三卷第三则“天狗传说与浅间岳求闻持之事”（「天狗の沙汰付浅間嶽求聞持の事」）写道“行人之道，可疑之事情便会消逝”（「ただ人道をおさむれば、其怪しき事もおのづから消えうするこそ侍れ」）等。特别是在《古今百物语评判》第二卷第五则中，元邻

1 意为妖异祸变因人之行为违背常道而产生。出自《左传·庄公十四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

2 意为邪不压正。出自《史记·殷本纪》“臣闻妖不胜德”。

明确提出“妖非德之理”（「もとより妖は徳にかたざる道理なれば」）的观点，这实际是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具体要求，即：妖不犯品德高尚之人，故人要讲正气。

但有学者主张，对人之“德”性提出要求并非儒学的特权，佛教亦主张修身养性，并由此认为佛教才是元邻解析“怪异”的思想依据。¹诚然，佛教作为一种资源，在传入日本后（特别是在中世时期）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产生过深远影响。但，《古今百物语评判》成书于日本近世，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上出现了掌握政治权利的武士阶层与掌握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双重势力并存的局面。两者出于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需要，均表现出积极接纳儒学的态势。在这种背景下，禅儒一体论观念逐步崩析，儒学不再是佐证禅宗之高明的材料，而发展成为独立于佛禅的思想体系，并占据统治地位。加之，近世以来，儒学表现出由“作为武士教养的儒学”向“包括商人阶层在内的市井儒学”过渡的倾向²，接触、学习儒学的人群由统治阶层扩展至一般民众，从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因此，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量，以儒学思想为依据解析“怪异”现象将有益于读者理解作品，同时也有益于发挥弃惑物的伦理功用。由此可以认为，虽不能否认弃惑物中“仍可隐约看到佛教思想的投影”³，但在当时儒学或已超越佛教等学说的影响力，成为弃惑物作家进行解析的主要思想依据。

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以儒学思想为依据解析“怪异”现象是十分缺乏科学性的，并进一步指出《古今百物语评判》中诸如“一切罪恶皆在远方”（「すべて、あやしき事は遠国にある」卷一「絶岸和尚肥後にて轆轤首見給ふ事」）、“此犬神不附体于王城之人”（「此の犬神王城の人に憑く事あらず」卷一「犬神四国にある事」）、“内心正直之人，千年狐狸亦不会骗之”（「本心のたゞしき人は千歳の狐もたぶらかす事なし」卷二「狐の沙汰付百丈禅師の事」）、“坚守内心则妖亦不能妄为也”（「皆内に守りあれば妖怪の者も事を為すこと能はざるなるべし」卷三「天狗の沙汰付浅間嶽求聞縛の事」）等表述，是“极为模糊的言辞”。⁴但事实上，日本近世并不是一个科学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从客观条件来看，虽在此时“南蛮学”“兰学”和“洋学”已然来到并开始影响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世日本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几乎是在锁国的客观条件下展开的，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统治阶层的干预与制约，结果便是导致日本对西方科学

1 参见 太刀川清：「『百物語評判』の意義」，『紀要=The Journal of Nagano-ken Junior College』33（1978）：1-7。

2 参见 小玉敏彦：「東アジア近世社会における儒教受容の諸相（1）江戸期の日本の場合」，『千葉商大紀要=The Journal of Chiba University of Commerce』52（2014）：15-31。

3 参见 堤邦彦：「怪异との共棲——『宿直草』に萌すもの」，『江戸の怪異譚：地下水脈の系譜』（東京：ペリカン社，2004年）78。

4 参见 太刀川清：「百物語評判」，『近世怪異小説研究』，東京：笠間書院，1979年。

的吸收“只精于其形与器，只知所谓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者，尚未预闻”¹。从主观认识来看，锁国时期能够接触到西方科学的大都是深受儒学影响并与统治阶层关系密切的学者，他们虽不否认西方科学的先进性和实用价值，但也无法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作为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来思考问题，或者说他们从根本上是畏惧科学精神的，从而难以从精神层面完全接受它。而一般民众则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科学，即使有所接触亦多将其当作新鲜事物看待，儒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不会因科学的到来而削弱。“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²，所以以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标准去评价三百余年前的文学作品，并诟病其缺乏科学性，显然是不合理的。换言之，《古今百物语评判》中的诸多解析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并为读者所接受和认同，依靠并不是它的客观科学性，而是主观合理性。而实际上，元邻也援引了《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中国医书以解释疟疾（卷三の二「道陸神の癘明の事」）、痘疫（卷五の一「痘の神疫病の神付乙の字の事」）等疾病现象，从而赋予作品以一定的科学性。

三、日本近世“弁惑物”的伦理功用

虽然弁惑物在近世日本十分流行，但囿于其附属地位，伴随着怪谈本的逐步衰落，不可避免地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弁惑物原版的数量并不多，除《古今百物语评判》之外，还包括《本朝俗谈正误》（『本朝俗談正誤』1691、作者不详）《秉烛或问珍》（『秉燭或問珍』1710、鷹見爽鳩）《万物怪异弁断》（『万物怪異弁断』1715、西川如見）《三才因缘弁疑》（『三才因縁弁疑』1726、村上俊清）《蛙之物真似》（『蛙の物真似』1728、克斎主人）《古今弁惑实物语》（『古今弁惑実物語』1752、北尾辰宣）《化物判取帳》（『化物判取帳』1755、敬阿）《太平弁惑金集谈》（『太平弁惑金集談』1759、河田正矩）《怪谈重问菁种》（『怪談重問菁種』1776、河田孤松）《鸟之啄》（『鳥之啄』1774、古隠子）《怪谈弁妄录》（『怪談弁妄録』1800、丹羽桃溪）《三教放生弁惑》（『三教放生弁惑』1803、寛潤）《人狐弁惑谈》（『人狐弁惑談』1818、陶山尚迪）等。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对于儒家典籍的引用，主要来自《庄子》《周经》《左传》《二程全书》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世日本奉儒学为官学，统治阶级出于阶级利益考虑，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各领域推行劝善惩恶论或文以载道说，而尤其打压以情爱（「好色物」）、滑稽（「滑稽本」）、怪异（「怪谈本」）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出版。在这种背景下，弁惑物作家大量引用儒家典籍，尝试

1 转引自 翟新、于大光：“近世日本对西方科学移植研究的主体及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1991）：196。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将儒学作为思想依据来解析“怪异”现象，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弃惑物以消遣为目的的文学特征，同时还大大提升了作品的伦理功用。这主要体现在：首先，一定程度上廓清了自古以来日本民众对“怪异”现象的蒙昧认知，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例如，在《古今百物语评判》中元邻以儒学的阴阳五行说和理气二元论解析“鬼”（第一卷第三则）、“雷”（第一卷第八则）、“温泉”（第一卷第四则）、“幽灵”（第二卷第五则）、“雪”（第四卷第七则）、“鬼火”（第四卷第八则）等“怪异”现象，从而为日本民众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既有认知的崭新观点，起到提高其思辨能力及理性思考能力的作用。

其次，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通过破除“怪异”之神秘性与超越性，以强调儒学的优势地位，这十分有助于幕府推行儒政，具有稳固封建统治的功用。具体说来，弃惑物旨在借用儒学观点合理解析“怪异”，其内在逻辑在于，首先将“怪异”纳入现实的而非超现实的秩序当中，在此基础上提出“妖不胜德”的伦理标准，企图在现实秩序即儒学秩序中实现对“怪异”的驾驭与控制。同时，还将“妖”与“不道德”“恶”等联系在一起，发挥“妖”的中介作用，从论证“德”对“妖”的支配，引向论证“德”对“不道德”的支配。而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能够对“德”与“不道德”做出判断的仅限于统治阶级，故而，弃惑物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发挥了稳固封建统治的功用。

最后，依据“妖不胜德”“妖非德之理”等儒学原理，对人之“德”性提出要求，试图以此协调掌握政治权利的武士阶层与掌握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之间的关系，在推进日本近世伦理建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仔细说来，弃惑物作者大都来自受过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们不得不兼顾武士阶级与工商业者两方面的需求。为此，他们采取引用儒家典籍以倡导“德”性的写作策略。这一方面满足了武士阶级推行“德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读者大众的消遣需求，同时还为他们调和阶级内部矛盾提供思想依据，从而促进了日本近世包括君臣伦理、宗教伦理、商人伦理在内的社会伦理建构。

结语

日本文学自5世纪起便开始绵延不断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滋养，特别是在进入近世以后，儒家思想更是成为作家进行创作的直接思想和理论来源。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弃惑物作为隶属于怪谈本门类下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并未沿袭中世怪谈本以佛教为思想支撑的文学传统，而是通过引用儒学典籍搭建起一个人与鬼怪共存又相互制约的自治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弃惑物对儒学典籍的运用略显保守，这与后世文学在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时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与选择性、创造性与批判性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即便如此，亦不能否认弃惑物在日本由中世向近世过渡过程中对既有文学伦理传统的超

越与更新，以及在启蒙民众、巩固统治、建构伦理秩序等方面所发挥的伦理功用。

Works Cited

- 『古今百物語評判』，『叢書江戸文庫統百物語怪談集成』，高田衛、原道生編。東京：国書刊行会，1987-1993年。
- [*Kokon Hyakumonogatari Hyoban. Sosyo Edobunko Zokuhyakumonogatari Hyoban*. Eds. Mamoru Takada and Michio Hara. Tokyo: Kokusyokankokai, 1987-1993.]
- 《性理大全》（影印本），胡广等纂修。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 [*Xingli Daquan (Great Anthology of Nature and Principle /Photocopy)*. Eds. Hu guang et al.. Jinan: Shandong Youyi Publishing House, 1991.]
- 《朱子语类》，张伯行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1982年。
- [*Zhuzi Yulei (A Collection of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Ed. Zhang Boxing.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Chen Chun. *Beixi Zi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門脇大：「弁惑物と狐憑き・狐持ち：『三才因縁弁疑』と『人狐物語』を中心として」，『国文学研究ノート』46（2010）：13-25。
- [Kadowaki, Dai. “Benwakumono and Kitsunetsuki / Kitsunemochi: Focus on *Sansaiinenbengi* and *The Tale of Man and Fox*.” *Kokubungakukenyunoto* 46 (2010): 13-2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寺敬子：「『百物語評判』と医学」，『日本文芸研究』1（2010）：1-22。
- [Tera, Keiko. “*Hyakumonogatari Hyoban* and Medical Science.” *Nihonbungeikenkyu* 1(2010): 1-22.]
- 翟新、于大光：“近世日本对西方科学移植研究的主体及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1991）：191-196。
- [Zhai Xin, Yu Daguang. “The Main Bod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Transplantation of Western Science in Early Modern Japan.” *Social Science Front* 2(1991):191-196.]
- 庄周：《庄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 [Zhou Zhuang. *Zhuangzi*.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